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新时期卷

赵稀方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新时期卷

赵稀方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 / 赵稀方著. 一天
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06-5183-4

I. 二… II. 赵… III. ①翻译 - 文学史 - 中国 - 20 世纪
②翻译 - 文学史 - 中国 - 当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50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88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新时期翻译文学概观	001
第一节 欧美诸国	002
第二节 俄苏及亚非拉	029
第二章 复苏	042
第一节 人民/译文/译林	042
第二节 莎士比亚	052
第三节 托尔斯泰/雨果	057
第三章 日本文学热	065
第一节 历史的“亮点”	065
第二节 《人性的证明》	074
第三节 川端康成	084
第四章 重返俄苏文学	095
第一节 经典的记忆	095
第二节 改革文学/军事文学	104
第三节 艾特玛托夫	108

第五章 美国文学的“再生”	115
第一节 “现代”的转向	115
第二节 海明威	121
第三节 福克纳	126
第六章 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	132
第一节 萨特热	132
第二节 弗洛依德热	146
第七章 拉美文学爆炸	156
第一节 拉美文学的“复出”	156
第二节 马尔克斯	160
第三节 博尔赫斯	169
第八章 历史的反省与承担	182
第一节 消失的“白银时代”	182
第二节 被改写的昆德拉	202
第九章 “《红与黑》事件”的背后	217
第一节 “等值”/“再创造”:一场误会?	217
第二节 翻译研究新思路	235
第十章 市场消费与文学翻译	251
第一节 《挪威的森林》	251
第二节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59
第三节 名著复译/魔幻文学	267
附录 相关翻译要目	279

第一章 绪论： 新时期翻译文学概观

翻译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或以国别为单位,或以翻译家为单位等,都可以事无巨细地交待出翻译出版的状况。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因为觉得这些写法容易流于材料的平铺直叙,缺少思想史的脉络,无法体现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的关系。踌躇之后,本书试图采用话题式的论述结构,以事件为中心,兼顾国别,希望在交待翻译史的同时大致体现出新时期话语建构的过程。

之所以以这种方式梳理翻译文学,缘自我对翻译文学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与西方当代翻译研究的新思路有关。在我看来,翻译文学不仅是外国文学,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翻译文学一旦成为中文,就成了中国文化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在新时期文化建构中担当着重要作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可以给翻译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在新时期,从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到弗洛依德、后现代主义等等,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一时间汹涌地冲击着中国。我们既可以用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冷战以后西方全球现代性的文化主导,也可以以自我殖民化理论剖析中国当代作家“追新”背后的“进化论”心态。然而冲击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内部的历史原因

决定的。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的阐释权力,翻译的效果等无不来自于内部,它折射了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新时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整体,而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作为一种外来思想资源的翻译便成为了本土价值冲突的工具。更为深入的研究,应该来自于对于这些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具体分析。有关于此种翻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书在第九章有详细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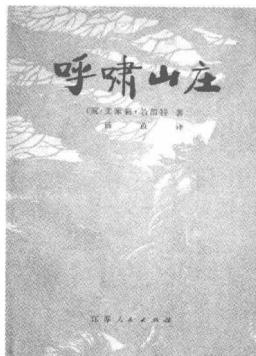
从结构上看,这种“话题”式的翻译史写作的不足之处在于,尽管本书已经尽量将“论题”与国别文学相牵连,但仍然无法全面地介绍国别文学的翻译状况,即便在某一时期介绍某国文学,重点涉及的多是一些影响中国文坛的特定对象,难以兼及其余,更有一些较少思想史意义的国别翻译无法提及。为解决这一问题,本书先在这里以国别为线索,对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作一大致的“概观”,以方便读者对于背景知识的了解。更详细的目录,见附录“相关翻译要目”。

第一节 欧美诸国

(一)

说到英国文学,不能不首先提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堪称新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开端和里程碑。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批重印的六本外国名著中,赫然出现了三部莎士比亚剧本,它们是《哈姆雷特》、《雅典的泰门》和《威尼斯商人》。新时期外国经典作家“全集”的出版,也首推莎士比亚。早在1978年4月,就有十一卷《莎士比亚全集》的面世。此后,莎士比亚的重印和翻译绵绵不断,有曹未风、曹禺、卞之琳、方平等名家名译的面世。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方平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这是第一部诗体莎剧全集的翻译。莎士比亚的“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的名言,成了新时期初期人道主义的宣言。

在英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是弥尔顿。中国翻译弥尔顿的专家是朱维之。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翻译弥尔顿,并在五十年代



杨苡译《呼啸山庄》
江苏人民 1980 版



全增嘏 胡文淑译《艰难时世》
上海译文 1978 年版

出版了《复乐园》。此后他开始翻译最著名的《失乐园》，没想到译稿在“文革”中全部被抄走。1981年，朱维之将译出的《斗士参孙》与《复乐园》合辑出版。接着重新整理翻译《失乐园》，终于在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至此，弥尔顿的三大诗作终于有了完整的中译本，这是新时期英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成就。

“名著重印”中出现的英国文学名家如狄更斯、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等人的作品，都是恒常的经典，有多种复译和文集的出现。

狄更斯自本世纪初林译以来就一直翻译不断，基础雄厚。新时期开始后，便有众多的重印和新译出现。1978年3月，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全增嘏、胡文淑翻译的《艰难时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1979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荒凉山庄》、《远大前程》同时被重印。截止1983年年底，《大卫·科波菲尔》一书居然出现了六个译本。新时期以后，狄更斯的作品几乎都被译成了中文。199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狄更斯文集》，堪称高水平之作，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第一个译本，是1936年的李霁野译本。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这个译本。不过在此之前，竟然已经有几个新译本出现了：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祝庆英译本；次年，即1981年，《简爱》又出现了周微林和陈小眉两种简译本。祝庆英译本在后来的二十年中，累计印数超过了三百万册，并在1998年登上

余

斯

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在中国影响也很大,新时期以前就已经有四种复译,其中杨苡译本后来较为流行。八十年代以来,《呼啸山庄》一直复译不断,已经出现了近三十种译本。九十年代,上海译文、时代文艺和河北教育分别出版了三套勃朗特三姐妹的文集,这些文集囊括了她们所有作品。

1980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了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的王科一译本。次年,又出现了杨国强翻译的该书的缩写本。1983至1984两年,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出现了王雨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2)和吴力励(北京出版社,1984,4)两个译本。1981年至1984年,奥斯丁的《爱玛》居然出现了四个译本,分别是钟美荪译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7)、刘重德译本(漓江出版社,1982,5)、亦骏、智祥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9)和张经浩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3)。奥斯丁的小说在八十年代初就得到众多的重译,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以后她的小说屡屡被拍成电影并获奖,激起欧美的“奥斯丁热”,导致了她的作品在中国再次热销。仅1998—2002年,《傲慢与偏见》就出现了近三十个译本。1997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了我国第一套《奥斯丁全集》,六卷本“全集”收录了奥斯丁的全部六部作品。

新时期之初重印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尚有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萨克雷的《名利场》,雪莱的《伊斯兰的起义》,拜伦的《唐璜》,司各特的《艾凡赫》,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

著名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的作品在1949年前尚有翻译,此后便沉寂了,差不多四十年间没有消息。新时期后,随着“意识流”的流行和女性主义的觉醒,伍尔芙开始受到重视。1986年5月,瞿世镜译出伍尔芙的一些理论和评论文章,编成《论小说与小说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8年和1989年,瞿世镜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伍尔夫研究》和《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伍尔芙的作品也得以翻译出版: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唐在龙、尹建新翻译的伍尔芙的长篇小说《黑夜与白天》;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孙梁、苏美翻译的《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198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还翻译的伍尔芙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199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伍尔夫作



▲贾辉丰译《一间自己的房间》
人民文学 2003 年版



▲曹元勇译《海浪》
上海译文 2000 年版

品精粹》。最后的集大成之作,是 200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至此,伍尔夫的主要作品都有了汉译。

五四以后,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在中国很红,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较大,译本也颇多。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兴起以后,王尔德的翻译开始衰落。1949 年以后,王尔德的译介几乎停止。1981 年 9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重印了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的童话集《快乐王子集》;10 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版了巴金译的《快乐王子》;1982 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荣如德翻译的《道连·葛雷的画像》;1983 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钱之德翻译的《王尔德戏剧集》。王尔德后来出现了很多复译,最多当推《快乐王子》。2000 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六卷《王尔德全集》,收齐了王尔德的全部作品。这是王尔德在中国的唯一全集。

著名英国现代小说家福斯特在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居然没有任何翻译,而 1981 年他首先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却并不是小说,而是那本在八十年代学界颇为流行的学术著作《小说面面观》,着实令人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福斯特,此后才被“发现”。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分别于 1988 年和 1989 年出版了林林、薛力敏翻译的《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李辉翻译的《露西之恋》;重庆出版社也在 1988 年出版了石幼珊翻译的《印度之行》。九十年代,国内只翻译了福斯特的一本论著《现代的挑战》(李向东译,作家出版社,1998)。另外,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福斯特选

余

希



▲ 石幼珊 马志行 董冀平译
《印度之行》重庆出版社
1988年版

集》，不过只收录了弗斯特的两部小说：《印度之行》（杨自俭、邵翠英译，1990）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李瑞华、杨自俭译，1992）。2002年，文洁若又译出福斯特的另一部小说《莫瑞斯》（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傅惟慈翻译的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1982年，毛姆的小说《刀锋》出现了两个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译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秭佩译本；1983年，毛姆的小说《人性的枷锁》也出现了两个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徐进译本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张柏然译本；1984年，毛姆的《寻欢作乐》又出现了两个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章含之、洪晃译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李珏译本（题为《啼笑皆非》）。毛姆的小说在八十年代初就有如此多的译本出现，当与其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的性质有关。可能是八十年代翻译太多，九十年代以后毛姆的汉译减少。199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毛姆文集》，除了《剧院风情》为新译外，其它都是旧译。

在八十年代中国，一个较受争议、也较流行的英国作家是劳伦斯。1954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宪之、徐崇亮翻译的劳伦斯的《白孔雀》。自此以后，劳伦斯在中国译界无人问津，《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更没人敢提。新时期最早被翻译过来的劳伦斯作品，是1983年的《劳伦斯短篇小说集》。1986年，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儿子和情人》在国内同时翻译出版，引起瞩目。因为性描写的露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自1928年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直至1960年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审判后才得以解禁。这样一本书在新时期中国引起关注、争议并流行一时，并不奇怪。它还带动了劳伦斯其它作品的畅销。次年，即1987年，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同时出现了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

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三个版本。此后，劳伦斯的书一直译本不断。时隔多年以后的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译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其“无删节”版本再次吸引了大众读者，荣登销售排行榜。劳伦斯的小说堪称经典，不过它在中国的畅销显然另有“看点”，近乎通俗小说。

说到通俗小说，英国还真值得一说。七十年代末期，英国通俗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及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小说在国内发表出版，《译林》杂志还曾因此受到批评。这两个小说家的作品，自此以后长盛不衰。至1987年，英国弗来明007系列小说又风行起来，加入了通俗畅销小说的行列。不过，最后登上中国销售排行榜的英国作家却是魔幻小说家罗琳，她的《哈利·波特》系列不但风靡中国，而且流行全球。

看来，英国不但能够产生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同样善于制造流行小说，堪称大“雅”大“俗”。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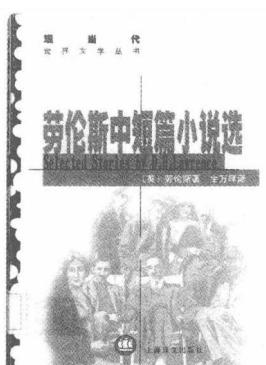
在“名著重印”中，法国十九世纪经典是其大宗，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莫泊桑、大仲马等名家名作成为一时之选，雨果的《九三年》更成为人道主义论争的重要思想资源。新时期经典名家重译之多，可以司



▲周煦良译《刀锋》
上海译文 1982年版



▲陈良廷、刘文澜译
《儿子与情人》
外国文学 1987年版



▲主万等译《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
上海译文 2002年版



▲ 罗玉君译《红与黑》
上海译文 1979 年版

汤达为代表。1949年前,《红与黑》只有1947年赵瑞蕻译本。1949年至新时期前,《红与黑》也只有1954年罗玉君译本。至新时期,《红与黑》译本骤然增加,计有郝运译本、闻家驷译本、郭宏安译本、许渊冲译本、罗新璋译本、臧伯松译本、赵琪译本、亦青译本等等,多达二十多种。围绕着众多的译本,评论界出现了不同的评论,最后演化为一场有关翻译的大规模的争议和讨论。

在新时期“现代派”的热潮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其文学作品风靡中国。在中国的“现代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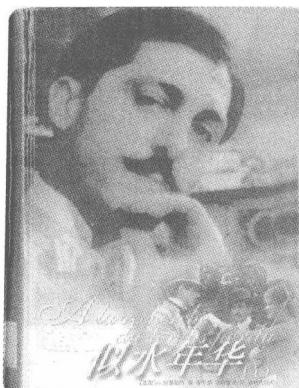
只能剥离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技巧时,萨特虽遭中国式的解读,却不能不说无意中为中国的现代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萨特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可以从1984年谌容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来。

法国另外一个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是加缪。加缪与萨特齐名,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比1964年获该奖的萨特早了七年。萨特与加缪本来是好友,后来萨特左转,加缪右转,导致决裂。萨特在中国颇受欢迎,加缪在1949年后却没有任何翻译。对于加缪的翻译,直到新时期才开始。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先出版了顾方济、徐志仁翻译的《鼠疫》;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宏安翻译的《加缪中短篇小说集》;198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李玉民翻译的加缪剧本集《正义者》;1989年,上海三联出版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散文集《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如此,加缪的中长篇小说及散文剧本在国内都得到了介绍。加缪和萨特一道,影响了新时期“现代派”文学。

然而,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宗,还不是萨特和加缪,而是未获过

诺贝尔文学奖的普鲁斯特。袁可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曾刊载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代》的片断《小玛德兰点心》和《斯万的爱情》(桂裕芳译),让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见识了真正的意识流。《追忆似水年代》这本书共七部 250 万字,卷帙浩繁,晦涩难懂,堪称最难翻译的法国小说。八十年代中期,译林出版社下定决心组织桂裕芳、许渊冲、许钧等十五位中老年翻译家共同翻译此书。全书由施康强译原“序”,罗大冈作代序。翻译差不多延续了十年,至 1994 年完成。虽然十五位翻译家的翻译手法不尽相同,因而影响了全书的风格统一,但这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浩大工程当称我国新时期法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成就。

普鲁斯特之前,还有一位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值得一书,那就是“恶魔诗人”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对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象征主义及现代主义诗歌有较大影响,但在 1949 年后却成了禁忌。新时期以后,波德莱尔重出江湖。1980 年 12 月,王了一据 1940 年旧译加以补充修改,出版了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其后《恶之花》又出现了另外两个译本:钱春绮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和郭宏安译本(漓江出版社,1992)。1982 年,亚丁翻译的波德莱尔散文集《巴黎的忧郁》也在漓江出版社出版。1987 年,郭宏安译出了《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1996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波德莱尔诗全集》。这本全集收录了波德莱尔各个时期的全部诗作,而且都是新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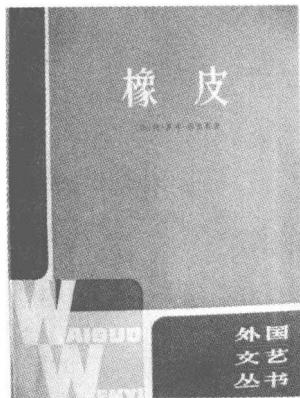
李恒基 徐继曾等译《追忆似水年华》译林社 2001 年版



钱春绮译《恶之花》
人民文学 1986 年版



王道乾译《痛苦·情人》
上海译文 1989 年版



林青译《橡皮》
上海译文 1981 年版

此后,在中国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法国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窥视者》早在 1979 年就由郑永慧翻译过来,《橡皮》于 1981 年由林青翻译过来,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布托尔的《变》也在 1983 年由桂裕芳翻译过来,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 年,柳鸣九主编的《新小说派研究》出版。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小说派文论选”,选编了萨洛特、罗伯-格里耶、布托尔三人的十篇论文;第二部分是“新小说作品选”,选译了萨洛特的《陌生人肖像》、《行星仪》,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和布托尔的《变》、《度》;第三部分是“批评家论新小说派”,辑录了包括萨特在内的五个人的评论。这本书的出版,让国人大体上了解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全貌。此后,“新小说”派四大干将罗伯-格里耶、萨洛特、西蒙、布托尔的作品,陆续被各出版社翻译过来。其中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译介尤多,后来还有《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出现。罗伯-

格里耶等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对于中国文坛的影响,是与博尔赫斯一道,促进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出现。残雪、余华、马原等人的小说中残忍的客观主义态度及非逻辑片断式的叙述语言,应该都与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叙事试验有关。

另外,杜拉斯在中国新时期十分流行。杜拉斯在新时期的第一个译本,是 1982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至八十年代中期,杜拉斯的《情人》忽然大行其道,短短时间内出现多种译本,计有 1985 年 7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王东亮译本,1986 年 2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王道乾译本,1986 年 8 月北京出版社戴明沛译本和漓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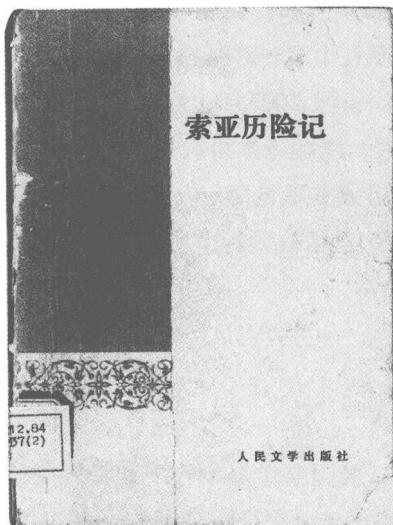
社的李玉民译本等。至九十年代,《情人》仍有新译本不断出现。在此情形下,杜拉斯的著作有了系统的出版。漓江出版社推出了“杜拉斯丛书”。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杜拉斯选集》。春风文艺出版社则从法国伽利玛出版社购买版权,组织翻译该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结成《杜拉斯文集》。关于杜拉斯是否法国新小说派一员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大体可以肯定,中国的“杜拉斯热”与法国新小说没有多少关系。正如《情人》这一书名所昭示的,杜拉斯的畅销与情感有关。另外,王小波等当代作家对于王道乾译本的推崇,也助推了杜拉斯的风行。

最后要提及的作家是米兰·昆德拉。自1987年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后,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一路畅销,引起文坛相当的注意。或许因为“被改写的昆德拉”的原因,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了由许均重新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新翻译本再次畅销,让人惊叹昆德拉小说在中国的生命力。说起来,昆德拉原是捷克人,捷克的历史经验造就了他,但他既然早已入了法国籍,这里就只能作为法国作家而提及了。

(三)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美国文学得到较多翻译介绍的是其社会批判文学。新时期以后,一方面传统翻译在延续,另一方面从前被遮蔽的美国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异军突起,成就了美国文学的“再生”。

由中国人翻译的最早的美国小说是1872年《申报》上刊登的华盛顿·欧文的《一睡七十年》,由于这部译文不太正式,人们一般将林纾1901年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作为美国小说翻译的起点。不过,林译本所译内容仅为原书四分之一,很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一直持续下来。1949年以来,这部社会批判的小说居然没有任何翻译以至重印,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八十年代初,这本书忽然“复兴”,翻译出版出现了高潮。1981年,林译本《黑奴吁天录》重印,刘重德翻译的同名缩写本也由湖南人民出版



▲张友松译《汤姆·索亚历险记》
人民文学 1978 年版

社出版。1982 年,这部书出现了两个全译本:一是张培均翻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黑奴吁天录》,二是黄继忠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汤姆大伯的小屋》。黄继忠译本考订了汤姆的辈分,认为英文 Uncle 在这里应该译成“大伯”,而不是“叔叔”。事隔八十年,这部名著被重新发现,两年之内出版了四个译本,可谓枯木逢春。

马克·吐温是中国译介最多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译名来自周瘦鹃,是他在 1917 年编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时用的译名。三十年代以后,马克·吐温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等在国内已有译本。1949 年后的十七

年间,马克·吐温的主要小说几乎全部译成了中文。新时期以后,马克·吐温翻译出版依然延续。连重印加翻译,马克·吐温的译本颇不少。1980—1982 年间,《王子与贫儿》出现了张友松、陈双璧和刘小薇三个译本;1982—1983 年间,《汤姆·索亚历险记》出现了张友松、胡华禹、梁欢和谭理四个版本;1981—1985 年间,《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出现了张万里、张友松、言实和郭健生四个译本。2002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马克·吐温十九卷集》。这部八百多万字的

文集,分为十九卷,包括马克·吐温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故事、游记、小说、人物传记、散文、杂文、政论、哲理文论、自传、演讲和书信等等,算是对于本世纪马克·吐温翻译的一次总结。

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诗人如郭沫若等产生影响。致力于翻译惠特曼的是楚图南,他翻译的《草叶集》于 1949 年 3 月由上海晨光公司出版,1955 年改名为《草叶集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新时期以后,国内先重印了楚图南 1955